

新时代楚都纪南城考古进展显著

楚纪南故城(以下简称“纪南城”)位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纪南镇,南距荆州市城5公里,长江10公里,北距纪山约25公里,东北距雨台山1公里,东南距鸡公山遗址2.5公里,海拔32米。

纪南城东西长约4550米,南北宽约3588米,城垣为夯土筑成,周长15506米,城内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我国南方最大的一座都城遗址。纪南城之名,始见于西晋杜预《左传·桓公二年》注:“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2011~2024年,为配合“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之夏商周课题”和“楚纪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工程”,新时代纪南城考古工作持续、系统、科学地展开,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收获。

城址年代得以明确

2019~2021年,通过对纪南城东城垣解剖发掘,基本搞清了现有城垣堆积状况及其建筑年代,并发现了早期城垣遗迹的存在,为城址形制变迁和始建年代确认提供了新线索。

纪南城现存超出地表以上的东城垣由墙体及内、外护坡组成,整体底宽约48米(内坡脚至外坡脚)。主体墙呈台阶状逐级筑成,底部挖有基槽,打破既有文化层及相关遗迹。内护坡长18米,外护坡长16米,均未发现夯筑迹象,应堆筑形成。外护坡下发现灰坑,其年代对城垣的年代判断有直接指示。据陶片判断该灰坑时代约为战国中期,结合其碳十四样本测年数据可以判定纪南城现存城垣的年代应不晚于战国中期。

本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在现有城垣底部发现了更早的城垣堆积。根据叠压关系将现有城垣定为二期城垣,新发现的早期城垣定为一期城垣。一、二期城垣之间有文化层和遗迹间隔,前者较之后者往城内错位约2米。一期城垣残存墙基部分,剖面略呈倒梯形,残宽约12米,残厚约1.2米。由于一期城垣内基本不出包含物,对其年代判断只能依靠地层和遗迹中之产生关系的遗迹遗物来进行。综合陶器年代分析和测年数据可以推断纪南城东垣一期城垣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这是对纪南城城垣始建年代的最新判断。

宫城区布局逐步清晰

2013年和2014年,以20世纪70年代勘探显示的东、北宫墙为线索,通过勘探追踪发现了宫墙东南拐角及两段西宫墙:宫墙东南拐角往西长约15米,宽约12米,拐角往北长约30米,宽约10米,保存厚度约80厘米;西宫墙北段长约120米,整体宽度10~14米,残存厚度5~25厘米;西宫墙南段长约36米,残宽、残存厚度基本与北段一致。据此,整个宫城区范围得以明确: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06、东西宽802米,面积达726612平方米。虽然东西三面没有证据表明宫门的大小数量,但是1975年北宫墙的勘探显示有两个缺口,疑为宫门。

最新考古工作对宫城区布局影响最大的是“环形界沟”的发现。环形界沟基本位于宫城区中心,北边距北宫墙230米,东边、西边分别距东、西宫墙135米左右。平面整体呈长方形,东北、西北角为直角,西南角为锐角,东南角为钝角。南北长565~575、东西宽463~525米,面积约27万平方米,相当于整个宫城区面积的三分之一。每段界沟宽窄不一,在7~18米之间,深约1.6米。环形界沟每边的缺口应当对应着几个宫门。

环形界沟将宫城区分隔为核心宫殿区和护卫区,其中松12(11)、13(14)、15(16)、6、7、8、9、10、22、24、20、21、25、62等17个台基分布在环形界沟内,组成了核心宫殿区,而环形界沟与宫墙之间分布有松1、39、30、27、31(32)6个台基,组成了护卫区。不难看出,核心宫殿区内的台基分布有较大规律性,可以将其分为三群,分别代表各自的功能:西北部的一群6个松12(11)、13(14)、15(16)最高大,所处地势最高,可能是宗庙所在,传世文献显示楚人非常重视对神灵和祖先的祭祀,同时楚地以农业为主,楚国以农兴国,所以,楚国的祭祀对象主要是神灵、祖先和社稷,那么西北群三个台基是否分别代表祖庙、神庙和社庙?东北部一群三组5个台基松6、7、8、9、10,现在地表能看出并经勘探确认松7、8、松9、10之间均有连廊相通,呈东西排列,并为一大一,高一低。松6东侧原本也可能有一个小台基与之相连,其布局类同松7、8,松9、10。这一组可能是寝宫所在,松9在三组台基中最大,又处

于最前面,应该是王宫,后面的松6、7则是后宫。而与之相连略矮小的松10、松8等应该是为宫内主人服务的侍从住处。位于宫殿区东南部的一群三组呈品字形分布,包括松22、24,松20、21,松62、25共6个台基。据勘探和以往资料分析,这三组台基均呈南北向排列,通过连廊两两相通,高大小基本相等,推断该群台基的性质为朝堂,是楚王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同时,东北群是寝宫,东南群是朝堂,也符合《考工记·匠人》记载“前朝后寝”总格局。

综上,纪南城宫城区被环形界沟分隔成为“三群一环”,不存在中轴线对称布局。界沟内核心宫殿区的布局规律性是分为三群,每群又都为三组或者三个台基,台基群呈倒“品”字形分布,界沟外则是护卫区或者其他功能区。核心宫殿的三组、三群之数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所为。但是,文献不曾有记载,也不见有学者就此类问题进行过论述,是否可以认为这与楚人某种宗教信仰有关?这种信仰应该与数字“3”有很大关系,好比古人对9、8有着某种特殊的崇拜意义一样。这种带有环形界沟的宫城布局一方面体现了南方“水城”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体现了楚人对周礼的改革与创新。

大型建筑初见端倪

纪南城2024年度考古工作主要是对城内外东北部纪城片区内广宗寺北台基群进行发掘。该台基群位于纪南城中部三条古河道交汇处东北部,南距松柏宫城区约1.5公里,隔龙桥河相望。

1975年对纪南城遗址开展的普探工作表明,纪城区有十五座夯土台基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广宗寺一带,是一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并于勘探时发现台基表面及周围覆盖有红褐色和红红色的瓦砾层。2023年11~12月对该片区进行复探表明,虽地表已不见高大台地,但距地表20~30厘米即可见东周文化层,至40~50厘米深度开始出现成片规则分布的夯土堆积,此区域内至少存在6处夯土台基,相互之间有低洼带间隔,形成疑似院落群组的存在,是纪南城集中宫殿布局的首次发现,需要逐年揭露并进行关键性解剖,2024年首先对广宗寺北台基群最南部纪7号台基进行发掘。

通过对纪7号台基的发掘及周边区域的勘探,基本确定纪7号台基为东周时期夯土台基,平面形状近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30米,面积约24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较丰厚。于纪7号台基南侧居中位置勘探发现一处向南凸出的夯土结构,与台基相连,东西长约10米,南北宽约2米,疑为台基残存台阶结构。

台基平面保存大量建筑倒塌堆积,从目前平面揭露情况并根据勘探结果判断,应为一处东西向排房形大型建筑,东西长约35米、南北宽约20米,面积为700平方米。主建筑东部可能存在附属设施区域,该区域南北长约20米,东西宽约12米,面积约为240平方米。附属设施区域东南部有一座偏房,平面形状近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约8米,东西宽约4米,面积约32平方米。

在纪7号台基西北部、北部分别发现纪2号台基、纪3号台基相关线索。纪3号台基南部似有廊亭遗迹,平面形状略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约5米。台基之间存在低洼间隔带及大量瓦片废弃堆积。由于此前发掘、勘探的城内夯土台基均保存较差,被晚期遗迹破坏严重。纪7号台基是新时代纪南城首次发掘到的具有较为完好垮塌堆积和建筑结构的大型建筑地点,为研究纪南城内部宫殿格局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纪7号夯土台基,厘清建筑布局、沿革和年代。同时,以初露的纪2号、纪3号台基线索进一步做好广宗寺北台基群发掘工作,找到台基之间连接结构和该组台基群的外围可能存在的院落结构,进而较为客观地判断该组台基群乃至整个纪城片区的性质及年代问题。

新的发现和指引了纪南城这座体量巨大的都城遗址的下一步工作方向:以两期建城和初露端倪的大型建筑为线索,进一步厘清城内布局和功能分区,并尽可能多地提供城址年代依据,继而大力充实城址形制变迁和周边聚落形态研究,为东周都城和楚文化研究注入新动力。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荆州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文物局 执笔:闻磊 李卓 黄凡雨 黄强)



纪7号、纪2号、纪3号台基及相关遗迹分布图



纪南城东城垣发掘正射影像

苏州古城秦代考古的新发现与初步认识

近年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利用城市更新的契机,在苏州古城区开展了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工作,获取了一些新资料,特别是在金城新村、混堂巷北、北园等遗址确认出一批秦代遗迹和文物,对南方秦汉考古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故先将相关资料做一简单介绍,并谈谈初步认识。

金城新村遗址

金城新村遗址位于苏州公园北侧,姑苏区五卅路148号,地处文献记载中苏州子城的北部。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累计发掘200平方米,发现灰坑、水井、碌碠和砖墩等遗迹30余个,出土了大批量以筒瓦、板瓦和陶管等为主的建筑构件,以及陶罐、陶盆、陶甗、陶鼎、陶鬲、陶范和陶拍等生产生活用器300余件,另外,还甄别出马、黄牛、梅花鹿和猪等十余种动物骨骼遗存。本次发掘地层上部均为近现代扰动回填的瓦砾堆积层,中下部为保存较好的历史时期堆积层。核心地层堆积可辨具体时代为春秋晚期至唐宋时期。秦代遗迹遗物主要发现于发掘区的中北部。

遗迹以H20和J6最具代表性,均开口于⑤层下。H20平面近似椭圆形,口径南北最长1.76、东西最宽1.32,残深0.18米。土扩结构,口大底小,斜弧壁,壁面粗糙,底部较为平整,有凹凸起伏。坑内填灰黑土,夹较多黄褐斑点和黑炭颗粒,土质较松软,湿黏,坑底集中堆积6件陶罐和各式陶片。J6平面近圆形,东南部被J3打破,口径1.15~1.4,残深2.6米。土扩结构,口部较底部略大,近直筒状,壁面较规整。井内填灰黑土,土质松软,湿黏,包含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甗、罐和板瓦等,可辨纹饰有粗绳纹、菱格纹和米格纹等。

遗物 出土遗物主要可分为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建筑构件:陶板瓦,T0803⑤:10,泥质红褐陶,修复完整。整体呈半弧形,上窄下宽,外表面饰纵向中绳纹,微斜,上部大部有抹平痕迹。内面上部饰粗绳纹,中下部饰菱格纹,可见模具痕迹。陶筒瓦,T0803⑤:53,泥质灰陶,泥条盘筑成形,由筒瓦和圆形瓦当组成。当面双钱界格四分,饰斜方格纹和云纹,边轮较窄且深。当背素面,凹凸不平。筒瓦正面饰纵向粗绳纹,局部有横向抹痕,背面饰横向粗绳纹,局部有纵向抹痕。当面与筒瓦一体模制。当面与筒瓦交界处两侧有对穿圆孔。另有同样规格的红褐色或灰色筒瓦:T0803⑤:71,泥质灰陶,泥条盘筑成形,修复完整。整体呈圆筒形,上端较下端略宽。器身中部有3组对穿圆孔。外表面饰竖向中绳纹,局部与横向刻划痕。内面粗糙,凹凸不平,清晰可

田野觅千秋——陕西泾阳小堡子西汉列侯墓园发掘收获

小堡子墓地位于咸阳市泾阳县小堡子村东南(现属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辖,已拆迁),地处咸阳塬东北部,在已发掘的大堡子西汉墓地之东南,西南距长陵邑约2公里。“片区制”考古实践证明,小堡子墓地处西汉墓葬密集分布区,2024年5月至10月,在配合当地土储工作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地进行了全面揭露,共计发掘墓葬近700座,绝大多数为西汉墓葬,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十分重要的是,在地块东北部发现了相对独立的大型墓园,规模宏大、随葬丰美,墓主应与西汉富民侯田千秋相关。

墓园宏大,达到列侯级别

墓园所处地势南高北低,用宽大围沟与小堡子墓地中的其他墓葬隔开,相对独立,未见被其他墓葬打破的现象。以围沟为区分,可划为2座相互毗邻的墓园,自北向南依次编为一号和二号墓园,共有大型墓葬5座,其中一号和二号墓园各2座,二号墓园南侧外1座,这些墓葬形制保持一致,平面均呈“甲”字形,为多级斜坡墓道的竖穴土扩墓,墓室有带级内收台阶,葬具为一棺一槨,槨外皆填木炭,槨底有垫土。墓道两壁设龛。

M1和M2位于一号墓园内,平行分布,坐西向东,过洞式甬道,甬道南北两壁各有1龛。M1总长36.4米,墓道长21.6、宽1.4~2.5米,甬道长5.4、高1.5~1.7米,墓室长11.8、宽8.3、深10.4米。木棺位于墓室西南部,棺外南侧发现保存较好的人骨一副,初步鉴定为男性,年龄30~35岁。墓室西北部及东部可见漆箱痕迹。M2位于M1南侧,总长42米,墓道长28、宽1.8~3.4米,甬道长6.2、高1.5米,墓室长11.7、宽9.5、深11米。因严重盗扰,棺形制不清。墓室内的人骨散乱且保存很少,初步鉴定包含有成年女性个体和成年男性个体。值得注意的是,M2墓室周围有向心式从葬的6座外藏坑,南9、北、西各2座,均作竖穴墓道土洞墓式结构,深约9米,出土大量车马明器。

见泥条盘筑痕迹。

生活用器:陶罐,H20:2,泥质灰褐陶,完整。侈口,圆唇,外斜弧沿,沿边内凹,矮颈,折肩,直弧腹,小底微内凹。器表上部光素,肩部有一圈凸棱纹,刻划“×(五)”字纹。下部饰交错细绳纹,内外壁可见轮制弦纹痕迹。T0803⑤:43,泥质灰陶,完整。敛口,宽弧沿,圆唇,短颈,丰肩,圆鼓腹,下腹敛收,小底微内凹。内外腹部可见凹凸弦纹痕迹,外壁上刻划“×(五)”字陶文,下腹及底部饰横斜向交错细绳纹。T0803⑤:28,泥质灰陶,完整。侈口,斜外沿,短颈,溜肩,球形腹,肩部对置牛鼻耳,下腹至底部饰交错绳纹,外底部微内凹,内底部微凸起。陶甗,T0803⑤:5,泥质青灰陶,胎质坚硬,修复完整。敛口,外折沿,沿面向外向上微斜,方唇内凹,斜腹,平底。器身外壁上部可见明显的凹凸弦纹,并刻划“×(五)”字纹,下腹光素,凹凸不平,较粗糙,器底有五个圆形穿孔。内壁亦可见轮制弦纹痕迹。

混堂巷北遗址

混堂巷北遗址位于姑苏区仓街以西、混堂巷以北,地处苏州古城相门内西北侧。

2024年6月至11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遗址区内现存四个文化层堆积,第①层为历代回填土,第②a、②b层为秦汉地层,第③层为春秋战国地层。秦代遗迹主要发现在第②层下部。本次发掘清理各类遗迹200处,包括墓葬2座、房址2处、灰坑49个、水井113口、灰沟5条、水池1个、基槽8处、柱坑20个(组);累计出土各类器物358件(组),主要有原始青瓷器、印纹陶罐、双耳耳陶罐、釉陶罐壶、青瓷和青花瓷碗盘杯等,另有铜削、青铜剑、泥塑器、石雕人像等器物,其中以战国至秦汉遗迹存为主。秦代遗迹主要为8口水井,均开口于②层下。水井均为土坑井,平面呈圆形,井壁微斜,平底,残深2.1~4.25米不等。出土器物多为陶器,1~7件不等。

北园遗址

北园遗址位于姑苏区平江街道北园新村西侧,地处苏州古城东北隅,北距现存古城北墙约200米,东距现存古城东墙约500米,西南距子城遗址约2500米。

2024年4月起,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文化层遭后世扰乱和破坏较严重,现存主体遗存属东周秦汉时期,遗迹均直接叠压在现代建筑基础之下,以水井、灰坑、灰沟等为主,在多口水井和灰坑里发现了秦代器物。水井多为土坑井,残存开口近圆形,口部较大,向下渐收,壁近直,深1.9~4.1米。在水井的底部出土陶罐、铜半两钱、砺石、绳纹残砖块及少量陶片。其中J32:1、J147:2灰陶罐肩部发现戳印“吴市”陶文。G23位于发掘区南部,整体呈东西条带状,壁斜直,底部不甚平坦。沟长5.66、宽0.34~0.54、深0.4~0.56米。沟内出土有大口甗底罐、双耳罐等,其中1件残破大口罐肩部刻划陶文。

初步认识

大量秦代高等级建筑材料在苏州古城子城区域的发现,确定了秦代会稽郡治的位置之所在。这是目前秦三十六郡郡治得到确认的为数不多的实例。秦会稽郡郡治的确认彻底否定了苏州古城始建于汉代的观点,验证了从《史记》以来各种历史文献记录的可靠性。

M3和M4位于二号墓园内,平行分布,坐北向南,无过洞式甬道。M3总长47.1米,墓道长35.6、宽2.8~6.4米,墓室长11.5、宽9.1、深10.3米。在墓道北部距墓室口3.7米处有一道砖墙,高约2米,其北置木箱,出土车马明器。墓道近墓室口西壁有2个壁龛。木棺位于墓室西北部,人骨散乱且保存差。墓室北部及东部可辨3个漆箱的痕迹;M4位于M3东侧,规模稍大于M3,被盗尤为严重。

M5与M1、M2形制相同方向一致,但规模略小。

与已经发掘确认的西汉列侯墓葬相较,上述5座大墓规模接近,且都配置了宽大围沟等墓域设施。

随葬丰美,彰显特定等级

这些墓葬虽经严重盗扰,但仍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器以及金器、螺钿和泥等珍贵文物。

陶器有鼎、盒、甗等仿铜礼器以及罐、仓、灶等生活类明器;原始瓷器器形主要为甗、壶;铜器包括胡人骑马俑、封泥匣、鎏金铜灯、熏炉以及大量车马明器,铜钱均为“五铢”;玉器包括口琕、窃塞、玉握、耳珥、带钩、玉珪、玉璧以及四角有孔的玉片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发掘还出土了一些较为珍贵的文物。金器除金印、麟趾金外,还有400余件金饰片,包括动物、人物、几何图案等形象,原应为漆箱等器上的贴饰;螺钿18件,其中7件口沿内壁带有彩绘,打磨光滑,制作精致,初步鉴定其材质包括鹦鹉螺、宝螺等海螺;二号墓园M3出土封泥30余件,印文内容主要为“富民家丞”“田贤士印”“田贤友印”。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彰显着墓主身份等级的不一般。

证据充分,指明墓主身份

根据墓葬形制和陶瓷器器型,小堡子5座大墓的时代应为西汉中期,结合其区位和共用围沟的毗邻关系,我们认为该墓园应为西汉中期居住于长陵邑的列侯的墓园。

“富民家丞”印文及田姓私印为进一步判定墓主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根据相关研究,汉代列侯的丧事主要由其家丞执办,“狄侯家丞”“汝阴家丞”“利成家丞”均为例证,可见二号墓园之墓主应与富民侯相关;据索文献,汉代获封富民侯者仅武帝朝最后一位丞相田千秋,至其子田顺因罪免侯,

代表“右司空”的“右”字陶文和一批与关陇秦核心区域的形制如出一辙的建筑构件表明,在秦统一六国后,在新征服区可能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定修建了地方官方建筑,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

虽然官方建筑构件采用了核心区的规制,但日用陶器却缺乏秦人代表性器物,如壶型壶、蒜头壶、小口罐,而多见具有浓郁楚国风格的陶器。这种明显的差异反映出中央政府只对带有官方色彩的建筑采用了统一标准,而对民间日用陶器采取了因地制宜,尊重地方传统的措施。木炭合丰M80出土的秦式陶罐,只是秦式器物偶然从关陇流入江南的个案。

苏州出土三例“吴市”陶文,是继广州“女(汝)市”、上海青浦“吴市”之后,南方地区发现的第三批秦陶文。特别是北园遗址和混堂巷遗址陶文“吴”字的写法明显不同,前者为典型的秦篆,后者为六国文字写法。这一差异为我们研究“书同文”制度的推行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吴市”,是“吴县市亭”的省称。市亭制度是秦代统一市场管理制度的重要措施之一,刚刚纳入帝国版图的吴越旧地也执行了和关中、关东等地一样的管理制度,显示出大一统王朝对周边强有力的控制。

作为江南地区首次出土明确的秦代陶器群,本次考古发现为江南型秦代陶器提供了图谱。这类器物时代和性质的确认对于周边地区进一步甄别秦代文化遗存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会稽郡是秦帝国东南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确定会稽郡及其文化面貌对探讨吴越地区融入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进程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程义 张志清 佟建一 宁振南)



金城新村出土秦代建筑构件



混堂巷北出土秦代器物

与“富民家丞”封泥共出的田姓私印可证史事。考古实物与文献之间的互证,使我们倾向于将二号墓园墓主推定为西汉富民侯田千秋及其夫人。

根据相关史籍,田千秋,又名年千秋,先祖为先齐大族,汉高祖时徙至长陵邑,本次发掘出土的螺杯或可作为田千秋的“籍贯”证据。千秋初为高庙寝郎,于“巫蛊之祸”后为戾太子鸣冤上书,得以升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并在几个月后迁任为丞相、封富民侯,历武、昭两朝,任宰相12年,最后终老于相位,是汉武帝时期少有的得以善终的丞相。

西汉封侯共计800余位,但经考古实证的列侯墓葬不足40座,相关研究尚处积累阶段。本次发掘确认的小堡子列侯墓园规模宏大、布局有序、葬品丰富且部分墓主身份可考,在西北列侯墓葬形制、丧葬礼制、西汉陵邑制度等研究中均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贯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建设考古“片区制”理念中的课题意识,以本次发掘为基点和抓手,系统梳理咸阳原东部部长陵邑、安陵邑周边墓葬考古资料,结合陵邑内一般居民墓地的已有认识,综合分析西汉陵邑的丧葬制度及其所反映的陵邑管理形态,为西汉京畿地区“大考古”模式的构建添砖加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执笔:朱瑛培 郭结 王渭真)



墓园布局



出土金饰片